



鲁迅历史

厦门大学中文系
福州铁路分局

0.2

鲁迅论历史

福州铁路分局政治部编
厦门大学中文系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121

鲁迅论历史

福州铁路分局政治部编
厦门大学中文系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3 1/2印张 73千字

1978年4月第1版

1978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73·103 定价: 0.22元

毛主席语录

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。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，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，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，最勇敢，最坚决，最忠实，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。鲁迅的方向，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

阶级斗争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
一些阶级消灭了。这就是历史，这
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拿这个观点
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，
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
唯心主义。

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
界历史的动力。

前 言

在鲁迅战斗的一生中史学领域是他的一个重要阵地。他在浩瀚的杂文、文学史、历史小说、书信、序跋和其他著作中，对史学有许多精辟的论述。特别是他后期的史学，注意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，辩证地总结历史经验，处处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，为我们树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典范。

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“读点鲁迅”的指示，学习鲁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学习鲁迅为革命治史的精神，批判“四人帮”散布的历史唯心论，批判他们的影射史学，以及他们篡改、歪曲鲁迅历史观的谬论，进一步肃清“四人帮”在史学领域的流毒，我们比较系统地辑录鲁迅关于论历史和如何研究历史的言论，编成这本小册子，供工农兵、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参考。

本书编排以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为指导，对鲁迅有关论述，我们努力理出其间的层次，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。小标题尽量采用鲁迅的原话，以保持鲁迅的原意。摘录时也注意了鲁迅思想的完整性，防止片面。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，有些地方作了适当的注释。

在编书过程中，得到有关部门和同志的帮助，我们在这里深表谢意。由于水平限制，书中对鲁迅原著的理解、标题和排编等方面，可能有不妥之处，热望读者批评、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七七年十一月

目 录

一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.....	(1)
1.人的意识“都受‘支配于经济’”.....	(1)
2.根深蒂固的旧文明“实乃进步的大害”.....	(6)
二、阶级与阶级斗争.....	(14)
1.“世界上有两种人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”.....	(14)
2.旧中国“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”.....	(18)
3.“在真的解放之前，是战斗”.....	(23)
4.“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”.....	(29)
三、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.....	(41)
1.“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”.....	(41)
2.无产阶级专政是“簇新的，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”.....	(44)
四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.....	(48)
1.“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”.....	(48)
2.没有民众，“就没有天才”.....	(55)
3.“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”.....	(57)

五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..... (62)

1. “历史的巨轮”决不“停运” (62)

2. 排击旧物, “催促新的产生” (66)

3. “我们总要战取光明” (70)

六、关于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(73)

1. “读史,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”..... (73)

2. “辩护古人,也就是辩护自己” (77)

3. 统治阶级歪曲历史..... (79)

4. “历史,就该另编一部” (82)

5. 全面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和著作..... (85)

6. “择取中国的遗产”,“采用外国的良规” (89)

7. 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..... (95)

一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，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

1. 人的意识“都受‘支配于经济’”

昔者初民，见天地万物，变异不常，其诸现象，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，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：凡所解释，今谓之神话。神话大抵以一“神格”为中枢，又推演为叙说，而于所叙说之神，之事，又从而信仰敬畏之，于是歌颂其威灵，致美于坛庙，久而愈进，文物遂繁。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，美术所由起，且实为文章之渊源。

《中国小说史略·第二篇神话与传说》（一九二三年十月）

所以为娜拉⁽¹⁾计，钱——高雅的说罢，就是经济，是最要紧的了。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，但能够为钱而卖掉。人类有一个大缺点，就是常常要饥饿。为补救这缺点起见，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，在目下的社会里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。第一，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；第二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。

《坟·娜拉走后怎样》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）

我平日常常对我的年青的同学们说：古人所谓“穷愁著

书”⁽²⁾的话，是不大可靠的。穷到透顶，愁得要死的人，那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⁽³⁾；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，决不会用一篇妃红俪白的骈体文⁽⁴⁾来诉痛苦的。所以待到磨墨吮笔，说什么“履穿踵决”⁽⁵⁾时，脚上也许早经是丝袜；高吟“饥来驱我去……”的陶征士⁽⁶⁾，其时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。

《华盖集·“碰壁”之后》（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）

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，到现在还如此。如果长此不改，“再而衰，三而竭”⁽⁷⁾，将来会连辨诬的精力也没有了。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，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，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。

《华盖集·忽然想到（十）》（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）

曾经阔气的要复古，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，未曾阔气的要革新。

大抵如是。大抵！

《而已集·小杂感》（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）

在我自己，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，都受“支配于经济”（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）之说，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。

《三闲集·文学的阶级性》（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）

第三篇《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》则批判主张游戏本能，先于劳动的人们之误，且用丰富的实证和严正的论理，以究

明有用对象的生产（劳动），先于艺术生产这一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底命题。详言之，即蒲力汗诺夫⁽⁸⁾之所究明，是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，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，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。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，就是于他有用——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。

《二心集·〈艺术论〉译本序》（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日）

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，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，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，这样的人，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，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。要做这样的人，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，要离开地球一样，……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论“第三种人”》（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）

食欲的根柢，实在比性欲还要深，在目下开口爱人，闭口情书，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，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听说梦》（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）

“人话”之中，又有各种的“人话”：有英人话，有华人话。华人话中又有各种：有“高等华人话”，有“下等华人话”。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无知的笑话——

“是大热天的正午，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，忽而叹道：‘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。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，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叫道：太监，拿个柿饼来！’”

然而这并不是“下等华人话”，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“下等华人话”，所以其实是“高等华人话”。在下等华人自己，

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，即使这么说，也并不以为笑话的。

《伪自由书·“人话”》（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）

某一种人，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，不能超出他本阶级之外。说起来，好象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，然而事实是如此的。谣谚并非全国民的意思，就为了这缘故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谚语》（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）

古人是怕查这种旧账的，蜀的韦庄⁽⁹⁾穷困时，做过一篇慷慨激昂文字较为通俗的《秦妇吟》⁽¹⁰⁾，真弄得大家传诵，待到他显达之后，却不但不肯编入集中，连人家的钞本也想设法消灭了。

《准风月谈·查旧账》（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）

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，是一种“清福”。不过要享这“清福”，首先就须有工夫，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。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，我想，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，在喉干欲裂的时候，那么，即使给他龙井芽茶，珠兰窨（xūn熏）片，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。所谓“秋思”，其实也是这样的，骚人墨客，会觉得什么“悲哉秋之为气也”⁽¹¹⁾，风雨阴晴，都给他一种刺戟，一方面也就是一种“清福”，但在老农，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，就要割稻而已。

《准风月谈·喝茶》（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）

所以一切女子，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，我以为

所有好名目，就都是空话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关于妇女解放》（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）

我想，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，而事情又由此发生变化的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（一九三四年三月）

古话里也有过：柳下惠看见糖水，说“可以养老”，盗跖见了，却道可以粘门闩⁽¹²⁾。他们是弟兄，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，想到的用法却有这天差地远。“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”⁽¹³⁾好的，风雅之至，举手赞成。但同是涉及风月的“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”⁽¹⁴⁾呢，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？

《准风月谈·前记》（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）

但既有消费者，必有生产者，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，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论“旧形式的采用”》（一九三四年五月二日）

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，思想和言语，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，那当然是“势所不免”的事。

《花边文学·“大雪纷飞”》（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）

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，一名“田园诗人”⁽¹⁵⁾，自然，他并不办期刊，也赶不上吃“庚款”⁽¹⁶⁾，然而他有奴子。汉晋时候的奴子，是不但侍候主人，并且给

主人种地，营商的，正是生财器具。所以虽是渊明先生，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，要不然，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，而且没有饭吃，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隐士》（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）

2.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 “实乃进步的大害”

那时候，只要从来如此，便是宝贝。即使无名肿毒，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，也便“红肿之处，艳若桃花；溃烂之时，美如乳酪。”国粹所在，妙不可言。

《热风·随感录三十九》（一九一九年）

凡中国人说一句话，做一件事，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，须一个筋斗便告成功，才有立足的处所；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。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，不许说话；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，为天地所不容。

《热风·随感录四十一》（一九一九年）

有人论中国说，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，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！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谗，但我们一翻历史，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时候罢。外寇来了，暂一震动，终于请他作主子，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；内寇来了，也暂一震动，终于请他做主子，或者别拜一个主子，

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。

《坟·再论雷峰塔的倒掉》（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）

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，每月收几吊钱，将煤灰之类搬出去。搬出去怎么办呢？就堆在街道上，这街就每日增高。有几所老房子，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，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。我不知道什么缘故，见了这些人家，就象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。

姓名我忘记了，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，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“活埋庵”⁽¹⁷⁾。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，都在建造“活埋庵”，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。看看报章上的论坛，“反改革”的空气浓厚透顶了，满车的“祖传”，“老例”，“国粹”等等，都想来堆在道路上，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。“强聒不舍”⁽¹⁸⁾，也许是一个药方罢，但据我所见，则有些人们——甚至于竟是青年——的论调，简直和“戊戌政变”⁽¹⁹⁾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。你想，二十七年了，还是这样，岂不可怕。

《华盖集·通讯》（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）

停止一种报章，他们的天下便即太平么？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，中国即无希望，……。

《两地书·六》（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）

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，施行袭击，令其动摇，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。

《两地书·八》（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）

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，而中国人偏多死亡，外族偏多侵入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可见我们蔑弃古训，是刻不容缓的了。

《华盖集·北京通信》（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）

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？每一新的事物进来，起初虽然排斥，但看到有些可靠，就自然会改变。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，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。

《华盖集·补白二》（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）

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：新起的思想，就是“异端”⁽²⁰⁾，必须歼灭的，待到它奋斗之后，自己站住了，这才寻出它原来与“圣教同源”；外来的事物，都要“用夷变夏”⁽²¹⁾，必须排除的，但待到这“夷”入主中夏，却考订出来了，原来连这“夷”也还是黄帝的子孙。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？无论什么，在我们的“古”里竟无不包函了！

《华盖集续编·古书与白话》（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）

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，讲理学，尊孔子，千篇一律。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，如王安石等等，行过新法，但不得大家的赞同，失败了。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，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，一直到宋朝的灭亡。

《集外集拾遗·老调子已经唱完》（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）

但是，有些读书人说，我们看这些古东西，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，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？是的。然而古

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。倘使我们觉得有害，我们便能警戒了，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，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。因为这是“软刀子”。

《集外集拾遗·老调子已经唱完》（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）

旧文章，旧思想，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，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，所坐的是牛车。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？从前尧舜的时候，吃东西用泥碗，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？所以，生在现今的时代，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。

《集外集拾遗·老调子已经唱完》（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）

革命虽然进行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，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，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；……。

《而已集·革命时代的文学》（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）

真实的革命者，自有独到的见解，例如乌略诺夫⁽²²⁾先生，他是将“风俗”和“习惯”，都包括在“文化”之内的，并且以为改革这些，很为困难。我想，但倘不将这些改革，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，如沙上建塔，倾刻倒坏。

《二心集·习惯与改革》（一九三〇年三月）

别的事也如此，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，于他们的风俗习惯，加以研究，解剖，分别好坏，立存废的标准，而于存于废，都慎选施行的方法，则无论怎样的改革，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，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。

《二心集·习惯与改革》（一九三〇年三月）